

清 徐增 著

說唐詩

樊維綱 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說唐詩

清·徐增 著

說唐詩

楚維綱 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饶有趣味的古代唐诗鉴赏集。选说唐诗三百余首。刊行之后“数十年风行海内，脍炙人口”，堪与《唐诗三百首》媲美。

著者徐增，字子能，号而庵，因而此书的全称为《而庵说唐诗》。而庵先生生当明末清初之际，身经家国之难，在选评唐诗时，亦带有明遗民思想倾向，寓褒贬，含悲情，文笔婉曲而又飞动，体会作品，颇为细腻。尤善咬嚼文字，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对此书颇为称赏。徐增是著名学者钱谦益的弟子，且与著名学者周亮工、金圣叹相友善。在本书的选评中，表现了深厚的功力和独到的识见，其解说方法和风格与《金批唐诗》相近，但在选诗分类及分解阐释方面较之更为细致完备，对后来唐诗选学和注评，曾产生重要影响。

校注者樊维纲先生，出一代词宗夏承焘门下，学力深厚，他历数十年整理出这部尘封已久的佳作，其重建之功是巨大的。

说 唐 诗

清·徐增著
樊维纲校注

责任编辑 范 炯

责任校对：温向苏

中川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辉县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插页 17.375印张 370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7-5348-0177-X/J·90 定价：11.00元

徐增和他的《说唐诗》

徐增，字子能，号而庵，清江苏长洲（亦作吴门或苏州）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明末秀才，明亡不仕，居家讲学著书。相貌瑰伟，性格褊急，晚年病足，不能步履。六十岁时尚在世，卒年不详^①。他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钱谦益的学生^②，与当时著名文学评点家金圣叹、著名学者周亮工相友善。工诗善书，尤长于解诗，选诗授学，十分热心^③。著有《说唐诗》（亦称《而庵说唐诗》）、重修《灵隐寺志》、《而庵集》，并选有《诗表》、《元气集》，亦曾解说清初人诗，似未刊行。他在明亡后，曾写有咏《黄牡丹诗》百余首，为时所称。他的这些著作，除前两种外，都已不传，其诗只偶有数首见于有关选本（如《清诗铎》）。关于徐增的生平事迹，笔者所知道的目前只有这许多。

由于徐增生平材料不多，就使我们研究他的思想存在很大的困难。这里只能就钱谦益所写《徐子能黄牡丹诗序》（见《牧斋有学集》）及其在《说唐诗》中透露的情况略谈一两点。

徐增生当明末清初，身丁易代之变，这一现实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和思想。钱谦益的那篇《徐子能黄牡丹诗序》，记了他本人读《黄牡丹诗》后的心情说：

仆本恨人，按湖湘红豆之歌，听秦淮商女之曲，则为之顾影骨惊，悲不自禁。情之感人，固其所也。子能属疾数载，

寢室空床，蕭然如道人禪老，不謂情瀾才海，波譎云詭，倒囊而出，一至于此。……子能身當劫後，緣情托物，能使揚州烟月，江左文章，攢花簇錦，涌現尺幅之上，安知劫灰起滅，不在文人筆端，一口吹唾耶？余言及此，又欣欣然有喜色矣。④

錢謙益是一個曾經投降了清朝的晚明官員，但他的思想行迹卻頗多曲折，故國之思和民族觀念也並未完全消失。上邊引的這段文字，就是他的一番自我傾吐。徐增的這組《黃牡丹詩》可惜沒有流傳下來，其內容我們也無從了解了。但從錢謙益讀了後能如此感動這一情況看，其中的黍離之感是不難想象的，因此這倒從側面為我們提供了了解徐增思想的寶貴材料。看來他應是屬於明遺民一類人物，是有故國之思和民族感情的。關於這一點，在他說唐詩時，于字里行間更是時有流露。如他在說杜甫《登樓》與《秋興八首》時，這種思想感情就表露得最為充分。有時几乎是直接傾吐，如他說：

子美意蓋謂：皇唐宏業，萬年永固，祿山破後，肅宗旋復，吐蕃繼入，主上即回。皇皇天朝，豈盜賊可得而覬覦哉！（《秋興八首》之六解說文。“主上”，指代宗。在說《登樓》時也有類似的話。）

有時則是間接流露，如說杜甫存心諒解或不願顯指故國、故主之失，而對安祿山等寇盜之罪行則痛予指斥。他這是說杜甫之心，其實也是在表白自己之心。又如他說李白《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詩時，把這詩作為李白的“絕妙一則史論”來看。他抓住了此詩“純贊子房未遇老人已前事，初不及遇老人已後一語”這一關節，認為李白寫此詩之本意在於：一方面稱頌張良以布衣擊秦皇帝，為韓報仇，“真惊天動地之事”，另一方面又惋惜他不該受黃石老

人的《素书》，去佐刘邦灭楚，灭秦之人，反为秦出气。这个见解，是颇能引人深思的。

他的《说唐诗》，《四库全书》未收，但于《存目》中将此书列入，有《提要》一条，一则说此书于推阐所选唐人诗作意时，“其说悠谬支离，皆不可训”，再则说此书“以分解之说，施于律诗，穿凿附会，尤失古人之意”，对之予以全盘否定。这两条罪状是实在的吗？凡是读了此书的人，都会作出否定回答的。那么《提要》作者否定此书的真正用心到底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从上述的作者说诗中表露的思想倾向去找答案了。另外还有两点情况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徐增与金圣叹的关系，两人同乡，又是好友，说诗观点相同。徐增在《说唐诗》中曾多次引用金圣叹的话，并对他极力称许。而金圣叹因“哭庙”一案被清政府逮捕杀头之日，正是徐增此书写成之时，并且很快将其付刻出版。而此书一出，即迅速广泛流传开来。这一情况，恐怕是在《四库》馆臣们考虑之中的。二是徐增与钱谦益的关系，二人是师生，过从甚密。钱谦益于降清后，思想上有反复因而引起清统治者的不满，如乾隆二十六年御批下令从沈德潜编的《国朝诗别裁集》中删去所选钱诗，理由是“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何足论”。到乾隆三十四年竟御批下令将其《初学集》、《有学集》销毁，理由是“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而徐增则在《说唐诗》中多次提到钱，称之为“钱宗伯”、“虞山钱先生”，对钱十分尊重。这种关系，不能不引起《四库》馆臣们的注意。《四库全书》编成于乾隆四十七年。而《总目提要》初步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四库》馆臣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说唐诗》进行全盘否定，又将它打入“存目”而不收，便是很自然的了。

《说唐诗》选说唐人诗共三百零五首（自序中说三百十九首，）

就作家和题材范围看，是比较广泛而多样化的，一如康熙五年陈鉴写的《序》中所说：

其事，若节序，若山水，若京国，若宫禁，若闺阁，若官方，若楼台，若羁旅，若边塞，若军戎，若怀古，若狭邪，若花鸟，若画图，罔弗秩；其人，有帝王，有公卿，有将相，有散僚，有隐逸，有侠少，有粉黛，有方外，罔弗登。

我们从他所选作家来看，有象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白居易等这样的大家名家，也有一般作家和一些不甚知名的小人物；有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可以说，不存偏见，不拘一格。但同时又突出重点，象杜甫、王维、李白三家作品则选得特别多，光是杜甫一人，就选了六十五首，占全书所选诗百分之二十以上。对入选作家，又于卷首撰为小传，予以简单介绍，这对理解作品也有一定帮助。就体裁说，几乎体体皆备，计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等七体。七言排律未选，这一体在唐诗中也确实不关重要，作品既少，成就也不高，缺之可也。这在清初以前，依体选诗，体体兼备的作法，尚属创举。沈德潜《唐诗别裁》分体选诗，当受此书影响。一如《昭代丛书》编者张潮在《而庵诗话》（即本书卷首之《与同学论诗》）跋语中所说：“不惟其文，而惟其体，又为选家辟一蹊径。”对于各体，不但都在其前作一简明扼要的辨体论述，而且还在《与同学论诗》中和说诗中时有论及。这些论述，对唐诗之辨体研究有一定价值。大家都熟知《唐诗三百首》一书，其实此书后出，在分体选诗和所选诗目方面（包括后来的注疏）都受了《说唐诗》的影响并吸收了它的成果。

关于此书说诗的作法，可以说是熔注字、诠词、解句、数典、征事、考证、辨析、阐义、谈艺、校勘于一炉，而以谈艺为主，

兼顾思想内容。这一作法，确为“从来所未有”^⑤，有其独创性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范例。同时他说诗的一些好见解和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探索和阐释，又对我们理解和欣赏中国古典诗歌，或从事、研究诗歌创作，都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关于这方面，陈鉴的《序》和周亮工的信，都对之有很公正的评价：

有阐发者，考注者，赞叹者，纠绳者，翻驳者，引喻者，诙谐玩弄者，诡譎讥嘲者；或沉深而渊穆，或显浅而流丽，或悒郁而哀愤，或禅悦而宣通。其所说，即肖所作，虽睨一鳞一甲，而识真龙，睹一苞一彩，而知威凤矣。（陈鉴《而庵说唐诗序》）

惟先生本《三百》之微文，窥古人之奥秘，句前句止，必有余音，联络而成，全关妙会。将有一字，数十字不能尽其含藏；一句，而数十句无以穷其涯际。深深广广，此道庶几。自有声诗以来，未有披拨云雾，昭揭日星，洞然豁然，于今日若斯之盛者。（《周栎园先生书》）

因之，把此书看成为初学者升阶入室之入门书也可，看成为一本唐诗评论集也可，看成为唐诗鉴赏的指导书也可，看成为诗歌创作论也可。

当然前人的评价不能代替我们今天的评价，因之对于本书之说诗，不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分析方面，都需要我们作重新评价，既要看到它的长处，有用之处，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之处；也要看到它的局限，它的短处，需要扬弃和避免之处。下边，对此书说诗之价值与存在的问题，谈一些笔者个人的意见。

关于此书说诗之价值：

一是不但选了相当数量的直接或间接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人民疾苦的诗，而且在解说时，又能深味原诗作者作诗本意，以其

心为心，以其情为情，对诗的内容进行深刻分析，使原诗更加闪现出光彩。如对李绅《悯农》诗的解说，把原诗二十字的内容，紧扣一个“苦”字，予以尽情发挥，说得字字飞跃，情景如见。不但说到了农民日午锄禾之苦，而且说到了秋收时田主（即地主）的逼租和勒索。在思想感情上，说诗者不但与诗作者融合为一了，而且表现了对农民艰苦劳动和所受剥削的深厚同情心。如对盖嘉运《伊州歌》的解说，不但指出了古人作闺情诗“偏要作良人不在家，在边上，以见征人久戍不归，妇人相忆之苦，惻然于衷也”的目的，又能以思妇之心为心，对诗中女主人公内心世界作了细致地描绘，真是“直使石人下泪”。徐增之前的评点家们，一般都只从艺术欣赏角度作零散地、片段地品评，而很少“发阐其作意”，本书则这样作了，而且发阐得如此痛快淋漓，恰合作者原意。但《四库全书·存目提要》却对其解说妄加以“悠谬支离，皆不可训”的罪名，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呢？另外，此书也选了一些有讽刺意味的诗，讽刺的对象，有皇帝，有权贵、官僚，有世俗人情，而且也都能深体诗作者的作意，予以精湛的解说，喜笑怒骂，诙谐玩弄，痛快之极。

二是说诗时能从诗作者写诗的客观环境，即所谓背景，及主观意图，即所谓作意着眼，而不是只在字面上琐琐，在格律上兜圈子，因之就能深入到诗作者艺术构思中去探求诗的奥秘，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诗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也阐发了篇章结构之妙和艺术表现的技巧。说长篇的如此，说短篇的也如此，说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干预生活的诗如此，说抒发作者情怀和描写山水田园之作也如此。如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这样一首表面上看来是写景的作品，解说时却能从杜甫写此诗时的客观环境和思想活动——即流寓于蜀，室家未宁，欲归不得；

不忘君国，思欲有为而无可为——这两方面进行探索，揭示出杜甫在句前句止所没有说出的和寄寓在所描写景物中的“潜台词”：写黄鹂鸣和，正为自己之有羡于黄鹂；写白鹭之高飞，正为自己有愧于白鹭；写西岭千秋，正为自己之漂流；写东吴行船，正为自己之思归。通过这样的分析，便使我们认识到杜甫这首诗不是简单的写景之作，其中还有一个诗人自我和这个自我背后的社会图景。徐增就是这样以说诗的实践，把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现实，写作必须有一定的目的和真情实感这样的原则体现出来了。本书说诗三百余首，一般都贯彻了这一原则，而且运用得灵活自然，方式多种多样，这对文学批评也是有意义的贡献。

三是说诗时能设身处地，深入诗作者心灵中去，说他所写诗的思想感情，而且往往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一如李图南《而庵先生说唐诗序》中说的：“而庵将诸子须眉毫孔，肝胆心肠，音容笑貌，及悲欢侠烈之气，活现写出，令读者知唐人性灵所在，而非徒留此形影而已也。”如他说杜甫《羌村三首》，不但能象一个画家，描绘出一幅乱离时代久别后团聚之家情景逼真的画面；而且象一名演员，既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探索、挖掘所要扮演的人物的思想活动，行为表现，而且能活灵活现，维妙维肖地把形象再现于广大观众面前。我们读了那娓娓动人的解说文字，宛然与杜甫一起回了家，亲眼看到了他同久别的妻子儿女相见后的一幕幕场景。在说第二首时，对杜甫和娇儿的心理状态，只用几句话便揭示出来了：“何其娇儿畏我复出门去？此是（杜甫）以己之心推娇儿腹中语。”就是说，“娇儿不离膝”，是畏我复出门去的行为表现，“畏我复却去”，是杜甫从“娇儿不离膝”的行为表现中推断出来的娇儿腹中语。子美之心，娇儿之心，当时的情景，不是说得清清如水了吗？⑥

四是说诗时，把对原诗的解说当作再创作来看待，能以自己的全副精神、饱满的热情、晶莹的性灵以赴之，因之其说诗文字，和原诗一样，也是一件光彩夺目的艺术品，能引人入胜，百读不厌。刚主先生就曾说到他读此书的情况：“每当佳节良时，风晨月夕，都把它拿来读一读，觉得很有趣味。”①读此书，我们常常会读到这样的篇章：诗作者的喜怒哀乐，就是说诗者的喜怒哀乐；诗作者的音容笑貌被描绘出来了，而说诗者的音容笑貌也被读者感受到了。如他说杜甫《秋兴八首》，简直就是在塑造杜甫这个流寓夔府而又无时不以国事为怀的爱国老人形象，杜甫写此诗时的心声脉搏，可以说一一被他体察到了。一如他自己所说：

“吾观此八首，未必有当，而子美心事，则吾审之熟矣。”而说诗者本人的思想感情波澜，也如杜甫一样，汹涌澎湃，东击西荡，平时不能直接出之于口的新朝之愤，故国之思，借此机会，如溃堤之水，一涌而出。又如他说崔颢的《长干行》，把短短的两首小诗，通过他的体察，敷衍成为一篇有人物、有情节、有特定环境的小小说式的解说文，不但男女两个主人公的心灵、面貌活现纸上，而且说诗者的容色、拍腔，也能为读者感受出来。这样的解说文字，往往能使我们得到双重的艺术享受，真是玲珑晶莹，使人把玩不舍。

五是说诗时特别注意篇章结构和字法、句法、章法。他在《与同学论诗》中曾告诉人们：“读唐人诗，须观其如何用意，如何用笔，如何装句，如何成章，如何起，如何结，如何开，如何阖，如何裁，如何联。”在解说时，自己就作了很好的示范。说古诗，一般重视解数，解数者，层次也，段落也；说绝句，一般重视起承转合，即各句之间的联与断的关系；说律诗，则两者兼顾。诗分解之说始于金圣叹，徐增与之同乡，又是好友，都从事

诗歌解说之学，受金圣叹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了。但他运用此说来说诗时，却有灵活变通处，同时也有他自己的一番理解。以分解之说来说古诗，这是他的发展，但有解可分者，分之；无解可分，也不强分。每解句数，也不拘限为四句。以分解之说来说律诗，认为承盖为起而设，转盖为合而设，承、转气相连而意不相属，故律诗意在起结，词在承转，这是他的发挥。但在运用时，也颇灵活，并且强调变，强调以“无法为有法”。而《四库全书·存目提要》竟以此作为否定此书价值的主要依据，实属妄说^⑧。看来还是《昭代丛书》编者张潮的话较为客观：“盖胸中确有所见，非徒为大言以欺世者。”（见《而庵诗话跋》）

六是对所选作品和诗中一些诗句的解释，有不少独到之处，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或对前人说法有所补充、翻驳。有的人，只看到此书“言涉俚鄙”，目的在“有裨于初学”，便忽视其学术价值，而不屑一顾，这是不对的。如他说杜甫诗，有不少是能出之以新意的，既为前代注家所未曾发，亦非其后选家、注家所曾见。如把《秋兴八首》作为一组诗，一个整体来看，说“前首结一句，与后首起一句意相通，直作一首诗读可也”。他还针对钱谦益早期注杜著作《读杜寄卢小笺》中这组诗的解释提出不少商榷意见，其中不少见解已被钱谦益采纳，吸收到他后来写的《工部草堂诗笺》（亦称《钱注杜诗》）中了。对一些诗句的解释，也颇有独到之处，如说白居易的《琵琶行》，对其中“击节”一句的解释是：“歌则用手击节，首为之动，故碎其钿头银篦。”按牛峤《应天长》词云：“凤钗低赴节，王孙破愁绝。”很明显，两句一写歌女之歌态，一写王孙之所态。所写情景与《琵琶行》相同^⑨。只可惜这些好的见解，长期以来不曾被人注意，白白埋没至今。

七是说诗时对诗中一些关键性的字和词语，能予充分注意，并解说得入情入理，惟妙惟肖。朱自清先生在其《论诗学门径》一文中对这一点曾给予充分肯定，说此书说诗“颇能咬嚼文字，启人心思”。此书之咬嚼文字，所以能“启人心思”，是因为它并不象有些人那样，孤立地来谈用词用字，而是从全诗、全句之精神命脉处着眼，与整首诗的作意、构思结合起来。如，在说杜甫《羌村三首》时，对其第一首中之“峥嵘”、“日脚”、“平地”等词语和“怪”字、“还”字、“遂”字等，都能从杜甫当时处境、心情着眼，紧扣全诗的精神命脉来解说，因而解说得十分精彩。而不象有的评点家那样，孤立地抓住一词一字，谈什么妙与不妙。这样来咬嚼诗中字义、词义的作法，即在一些诗话著作中亦不多见，其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并进行总结的。

关于此书的缺点和局限性：

象任何一部古代著作一样，由于作者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此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下边就笔者所见，略谈几点：

一是选说了一些糟粕性的或思想消极的作品。有的是奉皇帝之命或为娱乐皇帝而作的应制诗，这些诗的个别篇章，虽不无可取之处，但总的看来，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歌皇帝之功，颂皇帝之德。还有的是反映弃世绝俗的隐士或依佛的学道人思想生活的诗，说诗者信佛，于解说时又借机大谈其佛教玄理，因而消极作用更为明显。

二是说诗时有时顺带阐发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如：在说崔涂《除夜有感》“转于僮仆亲”句时，竟说“僮仆是最可厌之人，而竟成骨肉之亲矣”，这完全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来说话。又如：在说刘禹锡《石头城》时，说刘诗中往往流露牢骚，喜欢讽刺，曾经加

害过自己的人为有失“风人之旨”。这显然是用儒家传统的文学观点来贬低敢于讥刺统治者作品的社会意义。

三是说诗时常常站在维护封建礼教立场上来进行说教。如说杜甫诗，总是强调其对君主如何忠的一面，说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中兄弟》时，把诗中的手足之情，硬拉到“孝友”上来，说什么“读此诗而不下泪，其人必不孝友”。在说韩愈《青青水中蒲三章》时，一方面称道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善守“妇道”，另方面又宣扬“妇人不肯循分，则必须夫以宰制之”。这些都表明说诗者是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

四是说诗时好以禅机、佛性来探讨诗的内容和构思。如在说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中兄弟》时，认为后二句是用“佛转法轮法，非精于佛乘者不能”。一般认为王维此诗乃二十岁以前作，那时王维还不可能与佛教发生密切关系。以禅论诗，未尝不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来运用，因为佛家在参禅时的思维活动，与诗人写诗时灵感作用，颇有相似之处，但随处运用，把千变万化的形象思维活动都拉到禅机上来，就未免牵强附会了。既曲解了诗，也易把人引入迷途。

五是说诗时或因对所据史实缺乏考订，偶有错解之处，以至穿凿附会；或引用古文献材料时失于检核，时有差错。有关这类问题，将在注释中予以指出，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

下边谈一谈《说唐诗》的版本和流行情况。

据笔者所知，此书最早的版本是载有作者《自序》（写于康熙元年壬寅，即公元一六六二年）的九诒堂刊本，二十二卷，卷首一卷，封面牌记顶端有“周元亮先生鉴定”七字，卷首附有《周栎园先生书》。版式和字体都很美观大方，每页九行，每行十九字。但具体刊行时间不明，估计当在康熙初年。接着有李图南作

序（写于康熙五年丙午，即公元一六六六年）的青畏堂本问世（书口为九诒堂），此本质量较差。随即又出现收有李图南序的九诒堂重刊本和南山堂的翻刻本（此本质量亦差）。以上三本，皆仍为二十二卷，封面牌记与九诒堂本同。与此同时还有陈鉴序（亦作于康熙五年）的九卷本问世（据许文玉《唐诗综论》著录，此本笔者未见，但见到过据此本翻刻的嘉庆七年二南堂刊本）。稍后，又出现了有作者《自序》和写于康熙七年戊申征今诗《附白》的三槐堂刊本（书口为九诒堂），二十二卷，此本质量较好，后来又重印过，重印时收入了李图南的《序》。在此稍后，又出现了据此本翻刻的富春堂藏版刊本（书口虽为九诒堂，实际是假冒，质量甚差）。到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出现了文茂堂刊本，二十二卷，收有《自序》、李《序》、陈《序》，而无征今诗《附白》，但于封面牌记左上角加了一则重刻说明，其文云：

唐诗选本甚夥，惟徐先生说诗，律法考核详明，数十年风行海内，脍炙人口。原刻岁久，漶漫无稽，诸所翻刻，鲁鱼亥豕。今本坊不惜费工，精刊校正，识者鉴之。

此本质量亦较好，与九诒堂原本极似，亦每页九行，行十九字，封面牌记正中题为“说唐诗原本”（此本又有致和堂重印本，刊刻年代不详，版式与文茂堂本同）。次年又出现了崇德堂刊本，此本竟把李图南序的写作时间也改为乾隆己卯，李序、目录、封面及书口书名均改为《说唐诗详解》，而正文卷端仍为《而庵说唐诗》。此本显系书坊妄改翻刻。此后直到嘉庆七年才又出现了根据陈鉴序的九卷本翻刻的二南堂刊本，此本亦于封面牌记左上角刊录了文茂堂本的重刻说明，但此本质量亦差，并有一处刻乱了版，有重有缺。此后即未见此书有新的版本问世了。

从此书最早刊本问世（康熙初年），到文茂堂汇总各家序重刻这近百年的时间，出现过如此众多刊本这一情况看，文茂堂本重刻说明中所说“数十年风行海内，脍炙人口”的话是不假的。但这样一部曾在一段时间内“风行海内”的书为什么那以后就不“风行”，几至销声匿迹，而不为人知了呢？这恐怕与《四库全书》对它弃而不收与在《存目提要》中对它的“判决”不无关系（“判决”的原因已在前面说过了）。因为《四库全书》的编者们和《提要》的撰写者们无疑是代表清政府说话的，自有其政治意向和权威性。后人不查，由误信而至弃置不顾，再由弃置不顾而至不为人知。相反受它影响而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却取而代之风行起来了。

以上各种刊本，皆附刊有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写给作者的评《说唐诗》的信（书中题《周栎园先生书》），封面牌记上端也都有“周元亮先生鉴定”七个字。周亮工在当时政场里、学术界、文坛上都比较有地位，有声望。徐增与他先是文字之交，后来在苏州会过面，周在编《结邻集》时，收入徐增《而庵集》中关于论诗的信二则（见《与同学论诗》附录）。徐增出版此书时，请他进行审定、推荐，书的封面牌记上端标明由他“鉴定”的字样，并于刻书时将周的信也附上，这是可以理解的。

又此书各本皆于卷首附有《与同学论诗》，这篇《与同学论诗》曾被张潮辑入《昭代丛书》，改题《而庵诗话》，张潮并写有《小引》和《跋》。后来丁福保编《清诗话》，也将其收入。又据《丛书子目索引》，知日本的《萤雪轩丛书》亦曾将其收入，但此书笔者未见，估计当是采自《昭代丛书》。由于《而庵诗话》因《昭代丛书》而得以流行，以致有人只知有《而庵诗话》而不知有《而庵说唐诗》，甚至误把《说唐诗》当作他人之作^⑩。